



杨永松:最后一颗陨落的 新中国首批授衔将星

□ 王明哲



2022年9月1日，103岁高龄的杨永松溘然长逝。至此，1955年授衔的将帅全部作古。杨永松11岁时投身革命，12岁参加红军，15岁走上长征路，36岁就成为最年轻的开国少将之一，先后经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为新中国成立和人民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风起云涌的红色浪潮中受到革命启蒙

杨永松出生在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梅潭河流经于此，与梅江、汀江交汇于三河坝，这里发生过南昌起义之后著名的三河坝战役。起义军在三河坝地区逗留的时间虽然不长，却给当地播下了红色的革命种子。

1927年，在从新加坡返乡开展革命活动的二哥杨鹤松的影响下，年幼的杨永松加入了学校组织的劳动童子团，时常跟随团员参加大会和示威游行。次年，杨鹤松等人参与百侯农民武装暴动，给国民党反动势力当头一棒，但随后遭到敌人疯狂镇压，杨永松也因此逃离家乡，受雇于人成了放牛娃。1930年，在随闽西党代表去往闽西参加学习班的途中，杨永松加入共青团，其后留在闽西儿童团团部任组织科科长，接受张爱萍的直接领导，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和儿童学习成长而奋斗，自此正式踏上革命征途。

当时，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闽西开展了肃清革命队伍内部和红色区域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势力的斗

争，杨永松蒙冤被捕，极力争辩自己“不是反革命”。被释放后杨永松下定决心：“去当红军，让红军考验我，我是一心要革命的！”

在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中锻造意志信念

参加红军后，杨永松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在部队经过中央苏区的腹地长汀县时，他因病被留在后方医院，后遇战事吃紧，随几十名病号行走两日到瑞金后方总医院，但总医院也在匆忙转移，于是继续咬牙走至几十里地之外的九堡医院，到达后却发现空无一人。在绝望中，当地群众伸出援手，每人领几名红军病号到自己家吃饭。

军民团结如一人，让杨永松切身体会到红军与其他武装的不同，他与部分伤病员坚定了赶上红军大部队的信心。启程后，尽管身体虚弱，走上几十里腿便酸痛难忍，可一想到战场形势危急，就咬着牙互相打气、团结互助。历经5日，他们终于赶上大部队，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聂鹤亭看到杨永松革命的决心，将他留在师部工作。次日，部队通知傍晚出发，杨永松从报纸的种种消息中推断，红军坚持根据地斗争已很困难，这次出发必定是一个大的战略行动。追上部队的第二天，他便参与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壮丽史诗——长征。

三渡赤水前，杨永松调任一师三团司令部文书，在行军中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紧接着兵临贵阳后敌情大为缓解，刚刚经历“左”倾错误路线的部队切身体验了毛泽东的用兵如神。然而，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境况让部队步履维艰，翻越雪山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经统计，全团只剩880余人，不足长征出发时的三分之一。过草地时，杨永松直面死神的威胁，

他的双腿因长期泡在雨水中而麻木肿胀，站不起来，但最终他没有放弃，凭借顽强的意志，拄着树枝拐杖渡过了险关。长征途中的生死考验锻造了他百折不挠、无畏牺牲的革命意志，也铸就了他对党和军队无限的忠诚热爱。

在南征北战的烽火狼烟中锤炼革命本领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杨永松所在部队改编为八路军115师685团，他任团政训处技术书记。召开誓师大会后第二天，685团就作为全师先头团开赴山西平型关。9月23日，115师主动发起进攻，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日军比内战时期的白军凶猛得多，战斗非常惨烈，仅685团就死伤超800人，但官兵们英勇顽强、志在必得，以劣势装备毙伤敌1000余人，给了日军精锐板垣师团沉重打击，取得全面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打击了侵华日军的气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此后，杨永松跟随部队保卫忻口，转战晋西，挺进山东，浴血鲁南，在硝烟战火中不断成长。他时常组织部队在平型关大捷的战利品前做抗日宣传，极大动员了人民的抗日热情，也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在国共合作抗战的实践中，我军对政治工作的独特优势有了新的反思，将八路军各“政训处”名称恢复为政治部、处，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到达鲁南后，杨永松任115师政治部秘书长，接受罗荣桓的直接领导。奔赴延安学习时，又被调到抗大，在徐向前身边工作。丰富的阅历使他的思想觉悟、革命斗志、工作能力、作风品格显著提高。

1945年4月23日，杨永松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的身

份，出席党的七大，对党的路线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南征北战的革命生涯为他日后成长为我军高级将领奠定了基础。

在和平年代的军队建设中贡献智慧力量

1949年3月，杨永松被分配到第四野战军战车师任政委，该师下辖战车团、装甲团、教导团，其中战车团收集了从抗日战争以及辽沈、平津战役中缴获的各种型号坦克100多辆。战车师在开国大典阅兵中接受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1950年，装甲兵司令部成立，战车师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一师，承担了新中国坦克部队的主要组建和训练任务，并在编制调整和苏联援助下换装壮大，出征朝鲜战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杨永松任师政委。归国后，坦克一师划归华北军区装甲兵建制，杨永松随即调任华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

1955年，我军实行军衔制，杨永松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最年轻的开国将军之一。在隆重的授勋仪式上，杨永松忆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那些曾为革命事业、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浴血奋战的人，是他们的鲜血换来的和平安宁。他感叹自己无疑是幸运的，九死一生地度过了战争劫难，见证了党和国家的欣欣向荣，亲历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

1968年，杨永松任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1978年退居二线，任北京军区工程兵顾问，继续为我国军事建设贡献力量，1981年以副兵团级离休。在一次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他说：“抚今追昔，我们的军队比过去强大得多了，但光荣传统要很好地继承下去；我们的国家也富强了，但千万不能松劲，还需要提倡艰苦奋斗！”

浙东抗日根据地：孤悬敌后的战略基地

□ 成为杰

皖南事变发生后，党中央认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随后作出了在浙东建立革命武装、开辟根据地的战略决策。1941年5月至9月，浦东抗日武装分批赶赴浙东，与当地革命武装力量共同揭开了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序幕。浙东抗日根据地孤悬敌后，直接威胁汪伪政权的中心南京，抗击和牵制沪杭甬地区的日军，是新四军向东南发展的前进基地。经过4年多艰苦英勇的斗争，至1945年8月底，浙东抗日根据地历经大小战斗600余次，抗日武装发展到1万多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浙东抗日根据地地处敌伪顽夹击的险恶环境，但还是能够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关键就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党员和干部，有从浦东南渡到浙江的，有长期坚持浙东当地斗争的，有从新四军军部和苏中、苏南根据地调来的，有从长期埋伏在敌伪顽的营垒中随起义部队过来的，还有大量是新参加的。这些党员干部由于革命经历不同，思想理论修养参差不齐，工作作风、方法各异，早期曾经影响到相互间的团结，对工作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1942年9月，党委决定根据党中央要求开展整风学习运动。浙东抗日根据地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既学习《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中央规定的整风学习文件，又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基本军事知识。部队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进行整风学习，经历了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联系实际自我反省、检查交代开展批评、写自传小组鉴定和组织鉴定作出审干结论5个阶段。此后，来自四面八方革命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形成整体力量、统一行动，为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础。

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从政治高度思考战争问题，要求军事指挥员既要有军事头脑，更要有政治头脑。浙东抗日根据地在应对国民党顽军的军事进攻问题上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由于浙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伪顽我四方犬牙交错，国民党军队及游杂部队经常袭日军“扫荡”“清乡”之机夹击我军，先后对根据地发动三次大规模武装进攻，使浙东敌后斗争呈现出特殊性、复杂性和艰苦性。尤其是第三次反顽自卫战役体现了浙东党委和纵队领导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高度结合起来的战争指挥艺术。1945年4月，顽军田岫山公开投降日军，激起广大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浙东纵队抓住机会积极争取政治主动，发动了讨田战役，解放了上虞县城，却引来了其他顽军的军事进攻。浙东纵队再三警告之后被迫自卫，仅10天时间就彻底击溃来犯顽军。7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和军事重大胜利影响下，顽军张俊升部1000余官兵全体起义并接受改编。经此一役，根据地正式连成一片，党政军机构移驻县城，政治和军事上都取得了巨大胜利。浙东抗日根据地以抗战大局为重，严守“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努力维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也以自卫反击的方式坚决打退军事进攻，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发展壮大起来。

重视提高军政人员素质和部队战斗力。干部培训和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浙东抗日根据地特别重视干部培训，开展了军政大练兵，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1941年9月，党委和部队刚刚组建不久，就立即举办了第一期教导队，逐步扩大为教导大队。后来，党委决定以教导大队为基础建立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其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基本课程有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革命传统和政策纪律教育等，还经常邀请当地军政及文化界名人来校作报告。教导大队和

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他们在部队和地方都发挥了骨干作用。1944年7月，根据地从前方到后方，从机关到连队开展了长达3个月的军政大练兵。军政大练兵把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结合起来，在军事训练中既强调训练军事技术，又总结带兵养兵的经验，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路线教育方法。政治训练以尊干爱兵、改善官兵关系为重点，认真学习中央下发的整训经验文件，召开连队民主大会，干部战士分别订立爱兵和尊干公约。此外，根据地还举办了大量民运干部训练班、浙东鲁迅学院、卫生人员训练班等，为部队及地方输送了大量专门人才。通过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培训及练兵工作，部队及地方党员领导干部边打仗、边建军，各级党政军人员素质不断提高，为浙东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完成提供了干部队伍和人才保证。

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浙东抗日根据地从群众迫切需要出发，领导人民和军队坚决反击日伪的“扫荡”“清乡”“蚕食”和抢掠，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根据地还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帮助农民发展生产。1944年，浙东抗日根据地部队制定了拥政爱民公约，并通过座谈、联欢、团拜和慰问军烈属等形式，开展了拥政爱民活动。与此同时，根据地党政机关发动群众制定了拥军优抗公约，地方政府和群众掀起了劳军热潮。所有这些措施都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使浙东的党组织、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得到了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为坚持敌后长期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保障。抗日战争胜利后，部队根据上级指示部署北撤，在撤离中特别注重保护群众利益，限期收回根据地发行的“抗币”，以布告形式通知持币者用“抗币”换回粮食和现金，避免部队北撤后当地人民受到损失。此外，根据地还起草了《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姊妹书》，刊登在《浙东日报》上，向广大群众解释党的政策策略。这些措施最大程度保护了当地群众的利益，争取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为完成战略转移和日后再次解放浙东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把握人民战争的智能化时代之变

□ 赵卓

当前军事领域正发生着又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在战争中广泛运用，持续引发战争形态、战争手段和作战样式的链式反应。瞄准强敌制胜“下一场战争”，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科技赋能战争的历史性机遇，把人民战争这个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在智能化时代不断发扬光大，真正掌握未来战争的主动权。

战争伟力精准挖掘，制胜优势深度激活。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的主体，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兵民是胜利之本”，科技越发达，战争形态越高级，人的广泛参与的决定性作用越明显。智能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优势进一步被放大。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技术能够进行最广泛、最精准、最持久的政治动员，突破时空界限实现全时全域全维的人民战争，彻底激发和转化人民战争的战争潜力和实力，为战争胜利提供不竭力量。

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智能化战争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主要包括以AI为核心的认知对抗、以“智能+”和“+智能”为特征的融合作战等，智能的高低成为制胜的关键。平时时期，对抗博弈的重点聚焦于智能集中的科技领域，例如科技战；战争时期，主导权的争夺集中于智能优势的争夺，例如认知战。在国家层面，智能优势可以转化为决策优势和执行优势，进而形成组织优势、力量优势等总体优势；在具体的军事层面，军事系统制胜的关键是制智权。智能技术的嵌入使武器的演变主要围绕智能的控制与反控制、摧毁与反摧毁而展开，作战平台由信息化“低智”向类脑化“高智”发展，攻防模式向“智能主导、自主对抗、溯源打

击、云脑制胜”方向演进。人民战争在制度上所有的非对称优势、总体优势、人力优势等都可以几何级地转化和放大为智能优势，更强赋能聚优人民伟力。

自主高效分布作战，智慧科技全域支撑。现代战争的全域性、分布性、实时性要求人民战争的参战样式广泛多样，实现全维、全员、全程的灵活应对。智能化社会中，科技使智能化和延伸，社会演变为“类人体”，有了一定的“智慧”。此时的人民战争，各个作战单元和个人能够根据总目标在各个岗位各司其职，自主协同防御，实现全民国防，并能够根据外部威胁不断迭代进化，甚至在遭受军事重创后具有较快速的修复自愈能力，形成系统的免疫力。随着战场前置到平时阶段和渗透到各领域，人民战争再次回归到直接参战样式，舆论战、法律战、科技战、金融战、贸易战等，需要全民国防、全民参战。否则，一个打车软件数据的泄露可能使国家面临重大安全隐患，一个媒体舆论的失控可能引发一场颠覆政权的颜色革命。

智能化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参战主体随战争强度的变化而变化。当处于军事冲突阈值之上时，人民战争以军队为主、其他各条战线上的斗争为辅；当处于军事冲突阈值之下时，则以相关领域的斗争为主、以军队为辅。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其他领域的斗争显得越来越重要，即使是军事行动，其所涉及的情报、后勤保障等很大程度都依赖于地方甚至是全民的保障。

平战结合持久博弈，时空扩展权重加大。未来，大国之间的战争将更多地呈现出“亚战争”状态，即介于

战争与和平之间，处于军事冲突阈值下的一种综合对抗方式。一旦战争突破军事冲突阈值，也将是局部的军事冲突，虽然战场上的胜负短期可见，但战争引发的系统连锁反应以及后续在政治、经济、金融、科技等其他领域的攻防也将具有长期性。传统的人民战争建立在军事冲突的基础之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以战止战。

未来战争，当常态是“亚战争”时，战略关口将前移，持久胜敌的重点便转向预防、遏制军事冲突阈值上战争的爆发，通过持久竞争、对抗积累我方力量，转化敌我实力，迫使敌人不敢升级战争来遏制战争，即注重以平战结合的胜战能力威慑、遏制、控制、制胜战争。美国整合“国家力量的所有工具”，通过全政府战略、科技战、贸易战等所谓美国版的“举国体制”，共同服务于对华战略竞争的总目标，近年来联合盟友对俄开展一系列的金融、经济、能源、科技等制裁措施，除自身的战略目的外，都是适应战争持久性要求进行的战略举措。

军民一体全员参与，耦合关联体系较量。战争不仅是军事体系之间的较量，更是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综合体系的对抗。智能化战争中，科技高度发达，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呈现出平战一体、前后方一体、时空一体的特征，使得人民战争的组织形式趋向军民一体。提高科技向生产力、战斗力的贡献率，促进战斗力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互转化，既能以最少的战争成本最大程度地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又能最高效地发展经济、保卫经济建设成果，真正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美国自身就是一个军工复合体的国家，它的通信、航天、芯片等私

营企业都深度参与到我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在近年美军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世界局部战争中，诸如谷歌、SpaceX等公司所提供的服务甚至直接在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见，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战争中的组织形式向军民一体的方向发展已成为趋势。

战略战术灵活机动，指挥控制跨域协同。智能化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是复杂系统下的人民战争，遵循复杂系统的自组织涌现、层次转化、结构功能、整体优化和差异协同规律，内在要求指挥控制跨域协同，使战略战术更加灵活机动。具体表现为五个特征。一是跨域性。智能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涵盖所有领域，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类别。要达成战略目的，可以通过科技、金融等多种手段实现。二是融合性。现代战争的时空融为一体，战略与战术界限模糊、日益融合，通过战术行动直接达成战略目的。三是转化性。通过复杂系统的层次转化规律降维或者非对称地解决问题，比如将某一领域的作战理论上升为军种或全军的军事指导理论，完成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建设改革等。四是体系性。复杂系统中，各要素、各子系统相互关联，一个战略战术往往都是系列组合拳，需要各系统的相关要素全力配合，体系性支持才能奏效。五是创新性。通过自组织不仅可以根据实际产生灵活的战略战术，还能涌现出超越个人智慧的结构性创新。比如，通过对连接产生的海量大数据进行分析与计算，可以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关系，从而产生超越人们传统认知的方法智慧。